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三个重大关系

□ 王虎学

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及其在实践中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系列重大关系问题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绕不过去的重大课题。在诸多重大关系问题之中，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尤其受到了学界关注和讨论。

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两个马克思”的神话制造者首先来源于西方，主要集中在一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中。问题还得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称《手稿》）的发表说起。自从《手稿》1932年全文公开面世开始，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围绕《手稿》提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两个马克思”的主张，人为炮制了“两个马克思”的神话，即作为人道主义者的“青年马克思”和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的“老年马克思”。他们欢迎人道主义的“青年马克思”，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老年马克思”。在对《手稿》历史地位的评价中，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极力抬高青年马克思《手稿》的思想意义，而贬低和否定成熟时期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另一种观点极力贬低《手稿》的思想意义，否定《手稿》的思想与马克思后来著作思想的连续性。尽管上述两种观点看似截然相反，一个是贬低前期而抬高后期，一个是贬低后期而抬高前期。但是，它们在制造“两个马克思”的神话即把前期或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与后期成熟期的马克思的思想截然对立起来方面却又是惊人的相似，都是不正确的。

诚然，《手稿》存在着这样那样一些观点还不够成熟、表述和用语还不够稳定准确的问题，但是，《手稿》与紧随其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在基本精神、主要观点和致思理路上有着内在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观点和论题都以萌芽或胚胎的形式在《手稿》中得到了最初的讨论和表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赞同学界一些学者将《手稿》看作是马克思学说的“秘密和诞生地”。实际上，《手稿》不仅在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历程中，而且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史上都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因此，正如有学者明确指出的：通过夸大《手稿》的不成熟来贬低《手稿》的意义，进而制造“两个马克思”对立的神话是不可取的。在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依然不应制造“两个马克思”对立的新神话。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由来已久。自上世纪3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一直都是伴随着“两个马克思”的讨论而出现的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始于上世纪80年代。总体而言，在对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国内外大致有三种不同观点：“对立论”“一致论”和“差异论”。

“对立论”的观点是由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提出来的。卢卡奇在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首先指认出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待自然辩证法的态度不同。随后，法兰克福学派、萨特、施密特等都批评恩格斯把辩证法实体化，变成了世界观，而马克思仅把它看成内在于历史之中，自然本身并没有辩证法，只有人与自然相互作用时才有辩证的运动。西方“马克思学”者也明确主张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的对立。国内持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论”观点的学者，曾撰文阐述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学术思想方面的五大差别：即超验视野与经验视野、存在决定意识与意识决定精神、大写的真理与小写的真理、彼岸的自由世界与此岸的自由王国、个体性的分殊。

与“对立论”针锋相对的是“一致论”，后者否认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之间的根本对立，而明确宣称马克思恩格斯学术思想的一致性。当然，“一致论”观点也承认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差别，诸如二者在个人气质、知识背景、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差异以及二者在理论分工上的区别，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二者在基本思想和根本宗旨上的总体的一致性。况且，这种一致性在恩格斯逝世后也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普列汉诺夫、卢森堡、列宁等人的一致维护和坚决捍卫。国内已故哲学家孙伯瞬先生曾在《西方“马克思学”》一书中较早地对西方马克思学的代表人物持有的“对立论”观点进行了详尽考察，在揭露西方“马克思学”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论”的错误及其方法论根源的过程中，重申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的一致性。

第三种观点即“差异论”的代表性人物是美国“马克思学”家特雷尔·卡弗，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一书中，卡弗借用恩格斯的话提出了马克思与恩格斯谁才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第一小提琴手”的质疑，他的结论是：恩格斯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小提琴手”。卡弗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问题是一个解释学的问题，它依赖于评论者和文本、评论者和听众之间的对话，因而不可能得出一个一劳永逸的、唯一的标准答案。一些学者认为，对于“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讨论，重要的并不是在这一问题上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而在于研究问题的过程，重要的是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方法和对马克思、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的正确认识。当然，这既需要文献学的实证性研究，也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深度“耕犁”，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回到马克思”，从根本上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化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股客观存在的社会思潮，它包括众多的派别、庞杂的内容，在政治上和哲学上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和争论，很多派别和人物的思想在前期和后期都有着较明显的变化。因此，在国内外学术界，“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歧义不断的复杂问题。总的来看，有学者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大致概括为三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持全面否定的态度，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定性为“在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的反马克思主义”。这种观点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原则相违背，同列宁主义相对立，用唯心主义和西方社会学说的某些精神改造和扭曲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实质上的反马克思主义，因而根本不能算是一种马克思主义，这一观点主要代表的是一些苏联学者的看法。

第二种观点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划入马克思主义的行列，视“西方马克思主义”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推崇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式”，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为当代马克思思想的“真正传人”，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的发展，这主要是西方一些学者的观点。

第三种观点介于前两种观点之间，认为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流派，不要简单地斥之为反马克思主义，应该看到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不妨称之为“当代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这主要是国内一部分学者的观点。例如，有学者明确指出，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及方法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几乎都以不同形式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资本主义社会理论及无产阶级革命这些基本理论宣布为“过时”“失效”“错误”或“不充分”，断言需要用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素来加以“补充”“修正”或“重建”，其结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提的抛弃。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毕竟与马克思主义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辩证法、历史分析等方面的观点，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分，其中不乏合理的见解。

对此，我们既要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上的非马克思主义性质，又要看到它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注意它提出的某些有益的论点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的发展所做出的局部贡献。因此，不应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抬高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的高度，也不要简单地斥之为“反马克思主义”，而应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和评价。

理论研究

公平正义是人类共同价值

□ 云付平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价值目标，是全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价值理念。公平正义是全世界人民一直追求的理想，具有共同性。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诉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说文解字》释曰：“正，是也，公，平分也。”《辞源》中对“公正”的解释为：不偏私、正直。从最一般意义上来说，公平正义是指对人、对事坚持同一个原则和标准，不偏私。公平正义是衡量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是否正当合理的重要标准，其实现程度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公平正义是具体的、历史的、相对的，其本质是一种价值评判，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实现方式和实现程度都是不同的。因此，它的评判标准，应该与当时的社会历史发展实际紧密结合起来。

公平正义自始至终都在人类关注的视野之中，是全人类一直追求的目标理想，推动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变迁。公平正义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社会越公平、越正义，表明人类离开野蛮状态愈远。公平正义还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和方式，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坚持公平正义的理念有利于合理配置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利、责任和义务，有利于协调解决个人利益之间以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有利于实现人类社会有序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能够有效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进一步促进国家的繁荣富强。古今中外历史上发生的重大革命或变革充分证明，两极分化必然导致矛盾和冲突，危害社会稳定和发展。对于社会来说，公平正义就像阳光雨露。若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文明和谐的社会。不论在东方社会还是在西方社会，人们一直都在探求公平正义的路上，都在描绘着自己心中的未来美好蓝图。

中国传统思想家虽未明确提出“公平正义”概念，但却也有着丰富的相关思想。例如：老子的“以正治国”目标；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庄子的“公而不当，易而无私”理念；墨子的“兼爱”理论，提倡利益共享，惠及人人；朱熹的“惟公然后能正”主张，等等。这些社会理想主要从分配公平的角度描绘了一幅幅美好的发展蓝图，带有浓郁的封建宗法等级的色彩，对于维护封建礼制具有重要作用，也表达了人们对公平正义的向往和期盼。但是，无论是儒家的“仁爱”、墨家的“兼爱”、道家的“无为”、法家的“法治”、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等都是历史的产物，具有局限性，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不过，不容否认的是这些思想理论对今天的社会公平正义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意义。

西方社会也一直在探索公平正义的路上，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在西方古代社会，古希腊和古罗马是公平正义思想的源头。如柏拉图认为，“正义就是平等”。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是最主要的，它比星辰更加光辉”。西塞罗主张，自然法是公平正义的标准，“大自然是正义的来源”。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形成了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公平正义思想，主要以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人为代表。后来，还出现了功利主义的公平正义思想以及罗尔斯的“正义论”，等等。纵观公平正义思想在西方社会的历史演进过程，尽管由于受到历史的或阶级等的局限而存在着某些理论缺陷，但也无不体现了人类对这些价值目标的孜孜不倦的求索，也为我们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思想资源。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公平正义有着深刻认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相比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个人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和进步，实现了远多于以往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但是，私有制是导致剥削和压迫的根源，是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的根本原因。在那里，工人成为了机器的附属品，人与人之间只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而且并不是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就能得到一天公平的工资，资本主义用形式上的、表面上的公平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公平。恩格斯指出：“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在共产主义社会，将没有一切阶级差别，“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一切由这些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自行消失”。因此，必须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中国共产党人一贯主张并致力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人就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己任。先是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苦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接下来，经过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社会各个方面的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公平正义程度得到不断提高和完善。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反映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注重效率与兼顾公平的有机统一，从各个方面体现了社会公平正义原则。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和内在要求，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使全体人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使中华民族早日实现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核心价值追求”。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认识逐步深化，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大进展。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它的实现必须首先获取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平等权利。由于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异，人们对于公平正义价值的理解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但对公平正义价值的追求和探索始终存在，并一直处于不断发展进步之中，推动着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

发展与现代化

延安时期共产党人严以修身的品格

□ 赵耀宏

在全党上下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总结汲取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严以修身的经验，无疑对传承红色基因、做合格共产党员有着重要现实意义。严以修身作为共产党人的行为准则，是做合格共产党员的基础和前提。延安时期共产党人以严以修身的品格与风范，塑造了令人称道的“只见公仆不见官”形象，使我们党最终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也为今天共产党人严以修身、做合格共产党员留下了宝贵财富。

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严以修身的根本

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和修身之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把自己的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落实到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斗争的伟大实践中，忠实代表中华民族和最广大人民利益，从而使得天下人心归延安。“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这段文字生动地表现了理想信念巨大的向心力。我们党创办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之所以能成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一面旗帜，就在于其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求学员随时做好三个牺牲的准备，即牺牲升官、牺牲发财、牺牲生命。正是在延安这个培养人、改造人、锻炼人、提高人的革命大熔炉里，我们党造就了一大批政治信念坚定、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中国革命胜利提供了强大的人才基石。

重视学习是严以修身的基本途径

以学修身既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在延安时期我们党把学习作为党员干部增强政治素养，提升工作能力，克服本领恐慌的重要举措，在全党发起学习运动，大兴学习之风。当年陈云领导的学习小组就坚持了五年之久。曾在陕北公学总校高级部二队学习的陈辛火回忆：没有课堂，就在窑洞前的坪地上、在树荫下的空地上上课。在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轰炸延安的第二天，也照常到一个山坡上坚持上课。没有桌子、凳子，就席地而坐，膝盖就是活动的“桌子”。纸张困难，就用淡蓝色的马兰草造的纸写字，有时还用桦树皮写诗。每月发的一点有限的津贴差不多全用来买了书。只要新华书店到了新书，很快就被抢购一空。那时夜间照明条件很差，但是大家为革命如饥似渴地学习，常常围着豆粒大的灯光读到深夜。抗大学员的学习风气也非常浓厚，救国救民的执着追求，使学员们迸发出无以遏制的学习热情，就连参加劳动或行军打仗都坚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进行学习。“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写在大路上”，就是抗大学习风气的生动写照。正是重视学习使共产党人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能力与本领不断增强，开创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和中国革命由胜利走向胜利的新局面。

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严以修身的法宝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共产党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完善自我、净化灵魂的重要武器。深刻反省自己的缺点，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有效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共产党人是否具有坚强党性之所系。延安整风运动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其原因就在于全党上下从领袖到普通党员和干部都能够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当年由于在审干中发生抢救运动的失误，毛泽东曾先后三次作自我批评。博古等人过去曾经犯过错误，从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开始多次作自我批评，严格剖析犯错误的深刻原因。周恩来1941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学习中，亲自讲述从建党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党史，每当讲到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错误时，总是把自己摆进去，当众作严格的自我批评。在党的七大上就有8位同志作了自我批评。当年全党上下以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给许多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据许多老同志回忆，由于大家“事无不可对党言”，勇于揭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所以不但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也入了党，而且使大家相知更深，同志之间的关系也更加亲密无间。正是通过广泛深入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党员干部思想得以升华、错误得以纠正、心灵得到净化、党性得到锤炼，使党呈现出勃勃生机与活力。

艰难困苦是严以修身的最好课堂

以什么样的态度和行为对待困难、挫折和问题，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是其修身的重要课题，也是检验一个共产党人是否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的试金石。在延安时期，共产党人面对异常的艰难困苦，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斗志，以顽强拼搏、奋发有为的精气神，挺起民族的脊梁，书写出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1936年，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陕北采访中共领导人时看到：毛泽东住着简陋的窑洞，周恩来睡着土炕，彭德怀穿着用缴获的降落伞改制的背心，身为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的林伯渠耳朵上带着用麻绳系着一条腿的眼镜，他发现了共产党人身上具有的巨大力量，将其称之为“东方魔力”“兴国之光”。据延安时期的老同志回忆，毛泽东一件棉衣从1936年穿到1942年。朱德功高不自居，望高不自显，位高不自私，和战士们在一起除年纪大点，再没有什么区别。周恩来在抗战期间因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副部长，每月有几百元的薪金，但他每月只留5元津贴，其余都交了党费。刘少奇撰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得到稿费两千元，他胃不好，工作人员提出用这些钱买些大米吃，但他决不搞特殊化，坚持吃小米，而将两千元交了党费。任弼时由于两次铁窗经历身体遭到严重损害，但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一怕麻烦人，二怕工作少，三怕花钱多”，努力为党和人民工作。359旅作为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范，以“在深山密林安家，向荒山野岭要粮”的英雄气概，短短的三年时间就把南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南。由于战士们起早摸黑地劳动，使得359旅不得不制定“不得早到、不得晚退”的劳动纪律。共产党人正是以独立自主、顽强不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意志品格，经受住困难与挫折的考验，在人们心中竖起一座座丰碑。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严以修身的出发点和归宿

共产党人严以修身的根本目的全在于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道德观，科学回答了共产党人的人生目的、人生态度、人生价值等根本性问题。在延安时期，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不顾年纪高迈，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基层，了解民情，解决困难。“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是其张贴在床头的座右铭。“人人争识林老头，亲切有如家人父。灯前细谈几件事，米面油盐棉花布。”就是对林伯渠为民情怀的生动写照。1944年9月5日因炭窑崩塌而光荣牺牲的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党叫干啥就干啥，干一行爱一行，默默无闻，无私奉献，走到哪里就把好事做到哪里，他心里时刻装着群众，一次当组织让他去买猪，得知错赶了老百姓的猪后，他可以不顾劳累走几十里路把猪送还老乡；1943年春在修建八路军大礼堂时，当一根大梁要掉下来会砸着下面干活的同志时，他可以奋不顾身冲上去，用肩膀扛住大梁，避免一场事故发生；1944年他在烧木炭时，当炭窑要倒塌的危急时刻,他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战友，塑造了一个共产党人完全彻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形象。

党的思想史